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中国古代民族文物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4-2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秦, 晋庭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2282

试论中国古代民族文物

秦 晋庭*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早从传说时代起，我国各民族的先民们就在辽阔富饶的祖国大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遗留下来的、考古出土的、和从民间搜集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包括历史遗物和文化遗物），一般称之为少数民族文物，习惯上简称为民族文物〔秦 1989〕。

我国的民族文物，不仅是中华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近现代存在，而且古代也存在；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因此，我国的民族文物，一般又可分为古代民族文物、近代民族文物和现代民族文物。所谓古代民族文物，一般指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遗物，也包括反映古代各民族关系的历史遗物，范围广泛，种类繁多，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丰硕劳动成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真实写照。

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皇宫的藏品、地下出土文物、寺庙里的藏品、古代石刻（铜柱）、以及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物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民族文物作一梗概性的探索和轮廓的勾画。

一 皇宫是古代民族文物精华的收藏中心

据史书记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一向有朝贡的传统。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来，作为地方方物朝贡给皇帝，而后收藏于皇宫里的物品，除天然的珍珠宝石、奇花异草、土特产品外，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无不凝聚着古代少数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边疆各民族向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朝贡地方方物，其历史悠久漫长，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早在公元前21世纪传说中的虞舜时代，世居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人就把本民族特有的生产工具楛矢石镞献给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到了西周武王时，肃慎接受周武王的招抚，并贡楛矢石镞，表示文臣服于周王朝。据《国语·鲁语下》载：“仲尼在陈，有隼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镞，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

* 民族文化宫

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欲久照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责，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¹⁾孔子对肃慎的楛矢石砮颇有研究，了如指掌。他认为，周武王克商后，与周边各族加强联系，肃慎来贡“楛矢石砮”周武王还把“楛矢石砮”当作“珍玉”一样的贵重物品赐给异姓诸侯王，“使无忘服”，而受赐的同姓诸侯王则当作珍品藏于故府 [杨 1989: 222]。近年来在今黑龙江、吉林等地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古代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远在三千年以前的西周时期，肃慎朝贡楛矢石砮，是肃慎从事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当然，从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角度看，尚处于萌芽状态。

在“二十四史”中，关于边疆少数民族朝贡地方方物的记载屡见不鲜。班固在《东都赋》中描述皇帝接受哀牢朝贡而举行盛大宴会的情景时曾写道：“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作者的描述显然带有文学色彩的夸张成份，但从中可见一斑。就入贡的方物而言，既是使臣往来的礼物，也是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

秦汉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的朝贡已习以为常。据《太平御览》第708卷记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奉珍朝贡”，曾带来“积如丘山”的毛制品。这些贡品，是古代匈奴民族的聪明创造。数量如此众多，可见当时匈奴民族毛织业的规模。这些实物，对于内地汉族来说，无疑是认识和了解匈奴民族的媒介。换言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当今民族文物的某些功能。

据《三国志》、《晋书》记载，三国两晋时期，肃慎曾多次来向中原王朝朝贡楛矢石砮、弓甲等，其中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夏四月的朝贡，详细记载了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即国弓30张，石砮300枚，皮骨铁杂铠20领，豹皮400张。这些贡品，尤其是用皮、骨和铁制成的铠甲由此传入了中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豹皮400张，无论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还是今天都不是个小数目，这是肃慎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些实物，即是肃慎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原人民认识和了解肃慎的媒介 [杨 1989: 222]。

到了隋唐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王朝的朝贡已经非同寻常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高价贵了。以吐蕃人贡唐王朝的礼品看，从金银珠宝到甲冑兵器，从锦缯彩帛到古物珍玩，几乎无所不包；凡域内佳作珍品，方物特产，均在选精择美，馈赠敬献之列，而且品种数量极其浩繁，工本价值十分昂贵。贡品约有数百种之多。唐皇还特地展示于长安提象门外，向臣僚百姓夸示。这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贡品展示会。吐蕃迎娶文成公主，一次献聘礼“金五千两，珍玩数百”。这些人贡的物品，无不凝聚着

¹⁾ 左丘明著《国语·鲁语下》卷五，第42页，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古代藏族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陈 1989:10-11]。

收藏于皇宫的边疆少数民族的贡品，据推测，其去向大致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作为赏赐物，奖赏给了有功的大臣、将士；二是作为随葬品，埋葬于坟墓中；三是作为牺牲品，在战火中与皇宫同归于尽；四是作为历史文物而流传于今。在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收藏有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的文物。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保存有大量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仅西藏文物就在三万件以上，堪称西藏文物宝库。故宫的西藏文物种类繁多，为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及其在宫廷中的影响，研究明清时期藏汉文化的交流，研究清代边疆史、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王尧 1991]。由此可见，昔日的皇家藏品，是探索我国古代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然，这并不能从统治阶级珍惜保护少数民族文物及手工艺术的角度加以认识。皇家的收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收藏，或是作为地方方物、古董加以赏玩消遣而已，根本不可能从保护少数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劳动创造的角度出发。因此，收藏于皇宫的古代民族文物，一般不见经传，其来龙去脉往往难以说清楚，从而为后人的研究增添了无穷的难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地方性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收藏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场所。如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中心布达拉宫，收藏有大批珍贵的藏族古代民族文物。布达拉宫，巍峨壮观的琼楼玉宇，已成为西藏的代表性标志。从达赖五世起（清初），布达拉宫长期以来一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中心。宫殿依山垒砌，是我国著名的宫堡式建筑群。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布达拉宫不仅以建筑的成就著称于世，而且以辉煌的艺术作品和珍贵文物而闻名遐迩。宫内珍藏有大量的雕塑、壁画、匾额、佛像、唐卡、经书、法器、供器等文物，特别是精刻藏文大藏经，金字缮写的甘珠尔、贝叶经等，以及明清两代皇帝敕封历辈达赖喇嘛金册、金印、礼品等，都是稀世之宝。布达拉宫堪称为藏族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宝库。其藏品对于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艺术，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皇宫的藏品，绝大部分是作为地方方物朝贡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其它途径收藏的。其来源或途径尚待研究。然而，昔日的皇宫，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精华，是肯定无疑的。因此，昔日的皇宫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 地下埋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

开展民族文物的研究，从民间现存的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性实物着手，仅仅是入门的开始 [秦 1990]。而深入的研究，必须与考古学密切相结合。不言而喻，少数民族的今天，是从漫长的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对于古代民族的研

究，只顾在文献记载上作文章，仅仅是一个侧面而已。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不仅是研究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学科，而且也是研究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姊妹学科。古代民族文物，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动的古建筑、遗址、遗迹外，其它传世品是甚微的，与古代少数民族的创造相比，那是极不成比例的。而民族考古学从各个方面填补了古代民族文物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物的研究领域，为深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除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时埋入地下的外，随葬品占有主导地位。随葬，不仅仅是皇家富豪的奢好，寻常百姓也有这种传统。前面已经提到，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作为地方方物朝贡给皇帝的物品，其中有的作为随葬品而埋入了坟墓。这些再见天日的物品，无疑是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即使是寻常百姓的随葬品中，也包含着众多的古代民族文物珍品。此外，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其中还与古代少数民族的遗风有关。以铜鼓的出土为例，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云南的群山中，曾多次发现春秋、战国、宋等历代铜鼓，其中有的就是单个出土的，没有别的任何物品伴出。对此，说法不尽相同。其中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这与古代少数民族的遗风有关。其根据是当今云南彝族尚有把铜鼓埋藏在山上的风俗。埋藏时由专人负责，除了这仅有的两、三个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对于埋藏的缘由，尚无定论。但是，比较一致的意见则认为，这是古代埋藏习俗的遗留。

总而言之，将物品埋藏于地下有多种历史的原因，其一是为死者陪葬，即随葬品；其二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如地震、洪水等；其三是躲避战乱；其四是古代遗风。这些人为了和自然的历史原因，形成了地下的埋藏。民族考古学的发展，为研究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开拓了广阔的领域。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质地有：金、银、铜、铁、陶、瓷、丝、绸、棉、麻、竹、木等等，应有尽有。其用途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武器、乐器、印玺等等，无所不有。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雄辩地证明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还是编撰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珍贵参考资料。

第一，考古出土的民族文物，对于印证史书的记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古墓群的考古发掘为例。该墓群的发掘，揭开了湮没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古代滇国的奥秘。关于古代滇王国，史学家们常常引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然而，史书的文字记载，其真实性往往是难以印证的。1955年至1960年间，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晋宁县石寨山滇王族古墓群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共发掘古墓50座，出土4000多件古代滇国的重要历史文物。其中第六号墓的随藏品，总数有240多件，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滇王金印”一件。这颗金印的印纽是一条昂首盘绕的蛇，印文是汉字篆书的“滇王之印”四字。滇王金印的出土，完全证实了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说明这个墓的主人就是一代滇王，时代为公元前二世纪，整个墓群就是古代滇王及亲族的墓群 [王大道编 1986]。

第二，考古出土的民族文物，可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以铜鼓为例。尽管从《后汉书》算起，迄至民国年间的地方志为止，我国有关记述、著录古代铜鼓的著作，不下二百余种。但是，对这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却未给后人留下足够的记录，因此在铜鼓的起源、类型、年代、分布、族属、用途、铸造技术等诸方面，留下了空白。这并非在刻求古人，而有心说明的是，文字记录的不足，往往要靠科学考古来弥补。譬如世界上最古老铜鼓的问题，从奥地利学者黑格尔1902年出版《东南亚细亚古代金属鼓》一书以来，引起了莫衷一是的纷争。而楚雄万家坝古墓群铜鼓的出土，为平息纷争提供了可贵的论证资料。1975年5月下旬至1976年年初，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楚雄万家坝古墓群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发掘古墓葬79座。其中23号墓出土随葬品500多件，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铜器，有矛、剑、戈、斧、锄等兵器和农具。还发现了四面铜鼓。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共出土铜鼓五面。这些铜鼓在形状上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差别很大，花纹更为简单，原始古朴。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出土四面铜鼓的23号墓，年代是公元前690±90年（距今2640±90年），即公元前七世纪。因此，这四件铜鼓是迄今发现年代可靠的铜鼓中最早者。楚雄万家坝从此成了迄今世界上最古老铜鼓的出土地方。一些铜鼓研究学者以万家坝出土的铜鼓为标准，把与它特征相似的铜鼓归为一类，称为“万家坝型铜鼓” [王大道编 1986]。

再以鲜卑石室（嘎仙洞）为例。《魏书·序纪》提到拓跋鲜卑起源时，记有“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但大鲜卑山究竟在何方，无凭考证。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略，学者们的考证，只能是推论。因此，多年来众说纷纭，成了千古之谜。《魏书·礼志》中曾提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其中所说“祖宗之庙”，又称“石庙”、“石室”，这是确认大鲜卑山的唯一依据。但是欲寻找拓跋祖庙，其前提先要确定乌洛侯国方位。因此学者们多从这里入手。他们都是以代京（大同）为基点于其北四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去考定乌洛侯国。在《魏书·乌洛侯国传》中对乌洛侯国的地理环境及鲜卑祖庙石室的规模与方位都有所描述：

“……世祖真君四年，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其中所说的祝文石室，对于考证拓跋鲜卑祖庙石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欲寻祝文石刻，必首先确定旧墟石室。而旧墟石室的确认，又以石刻祝文为凭证。1980年7月，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十公里

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刻在时壁上的祝文，内容与《魏书·礼志》中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鲜卑旧墟石室的所在，解开了鲜卑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鲜卑石室（嘎仙洞）遗址及北魏石刻祝文的发现，对于探讨鲜卑等东胡民族的族源、文化渊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1988年2月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米女平 1991]。

第三，考古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众所周知，西夏灭亡以后，元、明、清三朝都未曾编撰西夏史。究其个中缘故，恐怕史料奇缺而使史学家难以动笔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西夏（1038-1227）是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性封建政权。当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多次进攻西夏国土时，西夏文物典籍在刀光剑影中累遭损失。西夏国灭亡后，文物典籍遭到严重破坏。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连党项族本身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了。昔日西夏文化的灿烂景象，只有从历史的陈迹中去寻找。20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献。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西夏文物、文献的大量发现，更加促进了我国西夏学术研究的发展。西夏文物的发现，对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对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西夏皇陵的发掘，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及下西沟岘山洞西夏文物的发现，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西夏洞窟的调查，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的再次发掘等，都有重要的发现和收获。此外，在北京、河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都有西夏时期或西夏后裔活动的遗物、遗迹的发现。这些文物的发现，为编撰西夏史及党项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史、白、吴编 1988]。

第四，开展墓葬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葬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葬俗，从形式上看，有树葬、水葬、火葬、天葬、岩葬（悬棺葬）、棺木土葬等多种。从葬具上看，有革棺、石棺、瓮棺、木棺、铜棺、船棺、竹篾棺、纸棺等多种 [宋 1991]。葬俗，是一种上层建筑，是古代民族对灵魂、来生、神鬼等问题认识的一种综合反映，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的一种综合反映。以1981年10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一具契丹女尸为例，女尸头戴鎏金铜面具，身穿铜丝网络和丝绸衣服。所穿的贴身铜丝网络是不多见的葬服，从头到脚，结构清楚。随葬器物主要是辽白瓷，还有腰佩玉柄铜小刀和刀形器各一件，制作精美，为辽代文物中所罕见。契丹女尸的出土，对辽代契丹葬俗及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墓葬壁画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以高句丽壁画为例，位于吉林省集安县的洞沟古墓群，是高句丽古墓最集中的地方，共有古墓万余座，已发现壁画的墓有十余座，其中前期壁画多画在墓室的粉白壁画上，主要描绘的是贵族生活，著名的有舞踊墓、角抵墓和洞沟12号墓等。其中洞沟12号墓

壁画上绘有房舍、家具、战斗、射猎、舞乐、礼辇、厩舍、庖厨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犹如一幅幅精彩的人物风俗画。晚期壁画大体是六世纪的作品，直接画在墓室平整的石面上，五彩缤纷，金壁辉煌。高句丽古墓壁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彭、刘编 1989:186-187]。

三 宗教寺庙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瑰宝

宗教，迄至近现代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仍然存在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宗教文物，是自成体系的一个文物序列，一般指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各种宗教的崇拜物、经典、法器、用品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文献资料等。民族文物与宗教文物，二者既泾渭分明，又有一定的交叉。在宗教寺庙里，一般都收藏着丰富珍贵的文物，其中以宗教文化为主，同时也不乏民族文物。因此，宗教寺庙是探索古代民族文物的不可缺少的途径之一。

首先，在宗教寺庙中，其本身就是文物的不在少数。20世纪60年代以来，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被确定为县（市）级、省（自治区）级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藏传佛教为例，其寺庙建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达13座之多，其中西藏地区8座，青海2座，北京、河北、甘肃各一座。这些建筑，气势雄伟，富丽堂皇，历经沧桑，巍然耸立，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高超的建筑技艺，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建筑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如始建于唐代的拉萨大昭寺，历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而形成当今的规模。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昭寺，巧妙地使汉藏技术和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是汉藏建筑技术的合璧之作。大昭寺内还保存有大批珍贵文物，包括宗教文物和民族文物。尤为称道的是位于正厅前方的唐蕃会盟碑，既是研究唐蕃关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又是汉族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无疑是珍贵的古代民族文物 [彭、刘编 1989:520-521]。

以伊斯兰教为例，其寺庙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达四座之多，其中北京、福建、陕西、宁夏各一座。这些建筑风格独特，巧妙地将伊斯兰教和汉民族建筑传统风格融为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精湛建筑技巧，是研究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及回族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如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1988年1月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主体建筑有礼拜殿、柳歌楼、望月楼、碑亭等。寺内收藏有一批重要文物，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圣旨牌匾，清嘉庆三年（1798）铸铁香炉，清道光丁未年（1874）铸铜香炉等。对于研究该寺的历史及我国伊斯兰教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实物资料价值，既是珍贵的宗教文物，又是难得的民族文物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 1988:121-123]。

其次，在宗教寺庙及石窟中，其本身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作的艺术宝库的不在

少数，而且有的还是宗教文物、民族文物的珍藏宝库。如著名的云南大理三塔（即崇圣寺三塔），历经千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摇撼，仍巍然屹立。三座砖塔，一大二小，鼎力而立，气势雄伟。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在维修加固工程中，在塔基和塔顶内发现文物680余件。据考证，这是南诏、大理国文物的一次空前巨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为我国佛教研究，而且也为云南古代民族史、宗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李 1981]。

又如名扬四海的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众所周知，其17号洞（即藏经洞），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偶然发现内藏有经卷、文书等历史文物5万余件，除汉文写本外，藏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并有绢本绘画、刺绣等艺术品数百件。这是20世纪初一件震惊中外的大发现，曾引起了一场国际间的掠夺战，大批文物被盗走，窟内艺术品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中国民族文物史上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彭、刘编 1989: 578-579]。

四 石刻（铜柱）中蕴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奇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勒石（铸柱）的传统。这些遗留于后世的石刻（铜柱）既是文献资料，又是实物资料，一向受到学者文人的重视。由此而形成了一门自成体系的专门学问金石学。以我浅见，其中也包含着民族文物的研究。尤其是清代，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到了顶峰，从而为今天的民族文物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清一代，在新发现的石刻中，金石学家们悉心研究，成果丰硕。毫无疑问，这些石刻碑记，在我国民族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少数民族发展史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金石学家王昶在云南大理太和城遗址发现的南诏德化碑。该碑立于唐大历元年（766），碑文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如统一五诏，西爨内乱，天宝战争，归附吐蕃，西开寻传，筑拓东城，设置官制等，记录详尽。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初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太和城遗址及南诏德化碑，于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彭、刘编 1989: 515-516]。

如清康熙十八年（1679）于旧石城（今曲靖市）遗址出土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该碑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971年），碑文记述了大理国国主段氏（白族）联合三十七部（彝族）出战滇东一些部落后，于石城会盟立誓，并颁赐职赏的情况。此次会盟汉文史籍中无记载，该碑弥补了史书的欠缺，是研究大理国和云南当时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大理国职官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彭、刘编 1989: 511-512]。

又如著名学者张澍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在武威清应寺发现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该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两面刻文,一面刻西夏文,另一面刻汉字,两面文字所述内容大体相同,但不是互译的,而是各自撰写的。碑文记述了城内护国寺佛塔因地震倾斜,西夏皇太后和皇帝下诏加以重修的情况。碑文提供了一些未见史籍记载的难得宝贵历史资料,是研究西夏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宝贵实物资料,是现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之一。1961年3月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刘编 1989:589]。

此外,还有一些石刻(铜柱)与古代少数民族有着十分密切关系,在古代民族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著名的溪州铜柱(立于今湖南永顺县境内)、地藏寺经幢(今云南昆明市)、袁滋题记摩崖(今云南盐津县)、居庸关云台(今北京昌平区)等,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居庸关云台,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券门和券洞刻有四大天王、金翅鸟、象、龙、蟒神等浮雕图案,并以梵、藏、蒙古、西夏、畏吾尔、汉等六种文字刻成陀罗尼经咒颂文。这种以石块拼接的大型浮雕,在古代雕刻艺术中极其罕见,艺术价值极高,是现存元代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六种文字同时刻在一起,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文化交流和相互交往的事实,是研究元代民族关系史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字学的实物资料,无疑是珍贵的古代民族文物[彭、刘编 1989:33]。

五 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产,是古代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建筑丰富多彩。从建筑的用途看,遗留于今的有都市城堡、寺庙宝塔、陵墓、桥梁、鼓楼等多种;从现存的形式看,有故城旧址、遗存遗迹、扩建重修、原物旧貌等,犹如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通史,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精湛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聪明智慧的劳动创造。

以宝塔为例,塔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是一枝竟放异彩的奇葩,历史悠久,造型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追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之际,令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我国少数民族在遥远的古代就与这种建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能工巧匠们,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使塔的形制逐步丰富多彩,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风格独特的建筑文化财富。根据造型、结构的角,本文仅择其具民族特色的三种形式分述如下:

第一、覆钵式喇嘛塔。这种类型的白塔,尽管从元代才开始兴建,但是,作为后起之秀,在我国现存的古塔中却是数量较多的一种建筑形式。颇为著名的有:北京阜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北京北海琼岛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舍利塔、内蒙古呼和浩特席力图召白石塔、甘肃兰州白塔山白塔、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塔、青海湟中塔尔寺如意

宝塔、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等，都各具特色而闻名遐迩。其中北京阜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为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修建，通高50.9米，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其中尤为珍奇的是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这是一个有规则组合的塔群，与普通寺院旁边的塔林大不相同，其排列方法是从上到下按照一、三、五、七、九……的奇数组合而成，共计12行，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塔阵。因共有一百零八个塔而得名。塔的造型皆为覆钵式喇嘛塔。

此外，还有灵塔，其外形类似覆钵式喇嘛塔，但制作材料颇为珍贵。一般用金银珠宝制作，豪华高贵，世所罕见。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的喇嘛寺庙或宫殿中。如拉萨布达拉宫中共保存有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八座灵塔，都是用金银珠宝制成。其中尤以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为高大豪华，塔通高14.85米，塔身全部用金皮包裹，珠宝玉石镶嵌。据史书记载，仅黄金就用了11万两，珠宝玉石达18680多颗，是我国最大最豪华的金塔。

第二、金刚宝座舍利塔。这种类型的古塔，现存的实物大多为明、清时期修建。全国共有十余处。颇为著名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宝座舍利塔、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金刚宝座塔、云南昆明官渡妙湛寺金刚宝座塔、甘肃张掖金刚宝座塔等，都各具有特色而著称于世。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金刚宝座舍利塔的建筑形制较为典型，塔的上半部，有五个小塔突兀高耸。宝塔的正中开圆形拱门，拱门顶上有横额一方，上有汉、蒙、藏三种文字书写的塔名。宝塔四周满刻天王、力士、佛像、罗汉、梵文经咒和八宝装饰，非常华丽。须弥座上又用琉璃砖贴面，色彩更为鲜艳。

第三、笋塔。云南景洪曼飞龙白塔，它的建筑设计借鉴了东南亚国家小乘佛教塔的形式，又结合了当地的建筑传统，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其造型犹如玉笋破土而出，故有笋塔之称。塔由大小九个塔组成，正中一塔突起，通高16.29米，八个小塔分立于八角，通高9.1米。优美的造型，洁白的塔身，衬托着蓝天白云，分外皎洁、和谐、壮观，堪称艺术佳作，建筑珍品²⁾。

结 语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少数民族的今天，是从历史上的昨天发展而来的。古代少数民族是怎样生活的呢？通过阅读古代文献可略知一二。然而，历史的文化的遗留物——古代民族文物，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直观的珍贵实物资料。我粗浅地认为，皇家故宫里收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精华，地下埋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珍品，宗教寺庙里收

²⁾ 关于古塔，本文主要参考了罗哲文著《中国古塔》[罗 1985]一书。

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瑰宝。石刻（铜柱）中蕴藏着古代民族文物的奇葩。在加上少数民族建筑文化遗产物。它们之间的总和。不仅构画出了我国古代民族文物的基本轮廓。而且从中也可领略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概貌。

（本文在定稿前，承蒙张甫民、刘志清、唐垂裕、宋军诸位先生审阅，并根据他们的宝贵意见作了修改。借此机会谨表示衷心谢意！）

文 献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

1988《北京名胜古迹》，北京旅游出版社。

陈小平

1989《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

李昆声

1981《大理三塔又现珍藏》，《文物天地》1981年第6期。

罗哲文

1985《中国古塔》，中国青年出版社。

米文平

1991《嘎仙洞鲜卑石室发现始末》，《文物天地》1991年第2期。

史金波、白滨、吴云峰编

1988《西夏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

宋德胤

1991《丧葬仪观》，中国青年出版社。

彭卿云、刘炜等编

1989《全国重点文物大全》，中国旅游出版社。

秦晋庭

1989《民族文物学初探》，《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4期。

1990《试论民族文物的征集范围》，《中国博物馆》1990年第2期。

王大道

1986《云南铜鼓》，云南教育出版社。

王尧

1991《故宫与藏学研究》，《中国文物报》1991年6月9日。

杨保隆

1989《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